

论“有偿推车”战略与中美合作

肖 洋 柳思思

[内容提要] “有偿推车”战略指“搭便车”者在现有霸权体系下与霸权国合作,共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当前的中美合作态势正是“有偿推车”战略的有益尝试。从中国方面看,维持现存国际秩序的稳定符合中国利益,适度承担与中国经济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向国际社会提供包括制度架构在内的公共产品,有利于中国从当前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向管理者转变。

[关键词] “有偿推车”战略 国际公共产品 中美合作

[作者简介] 肖洋,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战略;柳思思,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亚太与中东国际关系。

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提出,在政治、经济、军事与科技等各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霸权国家,通过为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国际金融体制、开放的贸易体制、可靠的安全体制与有效的国际援助体制等国际公共产品,来获取其他国家认同霸权国建立的国际秩序,从而实现体系内的稳定与繁荣。“霸权稳定论”的核心命题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成本由“某一”而非“某些”国家来承担,只有一个霸权国的国际体系才最为稳定。霸权国家之所以愿意承担稳定国际体系的责任,是因为“保持自由贸易、外国投资与一个功能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给霸权国带来的收益高于成本。因此,霸权国独自承担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成本在于其独享最大化的利益。吉尔平进而分析指出,因为国际社会存在“免费搭车”现象(free-rider problem),霸权国为保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而付出远超过它应该承担的费用,令其蒙受巨大损失,加速霸权的衰败。然而,他没有详尽论述当霸权国衰落后,“搭便车”者尤其是崛起国除了挑战旧霸权国权力之外的其他战略选择。特别是在国际公共产品成本负担问题上,“霸权稳定论”把众多“搭便车”者看成了同质的行为体,即对国际公共产品的匮乏都选择袖手旁观,任其形势恶化,而忽视了“搭便车”者之间存在的实力等级结构、对国际秩

序的认同程度,以及对霸权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依赖程度的差异,这就抹杀了“搭美国便车”的各大国分担国际公共产品成本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全球化的今天客观存在。这就为本文探讨“有偿推车”战略提供了空间。

一、“有偿推车”战略的理论背景

国际关系史上曾出现过两种大国崛起战略:“免费搭车”战略与“自驾车”战略。“免费搭车”是指在集体行动中,一个人或组织既不提供公共产品也不分担集体供给公共产品的成本,从而免费从其他人或组织的努力中受益。在国际关系中则指大国免费享用霸权国提供的国际自由贸易秩序、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与国际安全环境等国际公共产品,从而快速提升本国实力。如二战后的西欧各国与日本就是靠搭美国的便车而迅速医治好战争创伤,实现了本国经济复苏和振兴。选择“免费搭车”的国家能较大程度地节约本国发展成本——这符合经济理性原则,但并不符合政治理性原则,即国家对国际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06页。

申明民:“‘搭便车’问题在政治解释中的应用及其局限”,《开放时代》,2001年第10期,第32页。

政治结构中较高地位的需求。对于大国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一个国家“搭他人便车”的代价是较低的国际政治地位和较弱的国际影响力。因此,某些国家将不选择“搭便车”,而是选择“自驾车”战略,尤其是在国际公共产品匮乏的情况下。

“自驾车”战略是指某些大国在现存霸权国式微的情况下,对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产生质疑并提出建立以自身为领导的国际新秩序。“自驾车”战略的目标在于获得最高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在新秩序下的最大收益,如20世纪初的德国,妄图打破英国建立的国际秩序,不惜发动战争以建立德意志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但实现“自驾车”战略要面临巨大风险,这不仅是因为创建新秩序的成本巨大,而且要应对来自霸权国的打压与其他“自驾车者”的竞争,更要考虑国际社会对新秩序的认同。老霸权国的衰落,并不必然伴随旧秩序的终结,特别是老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时精心设计的国际机制,已经成为一种约束国家行为与交往的规范,并得到国际社会成员相当程度的认同和遵守,这也是旧的霸权秩序难以迅速被替代的根本原因。此外,选择“自驾车”战略的国家还必须拥有可以持续弥补该战略巨大成本的经济剩余与国内民众的坚定支持,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辽阔的国土与团结有力的领导集体等,显然这不是每个大国都具备的。

霸权必衰是霸权稳定论的基本假设之一,其后果则是国际公共产品日益匮乏,“搭便车”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国际政治结构中的矛盾冲突也越来越尖锐。在核时代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而实行“自驾车”战略不仅违反国际法“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等基本原则,还忽视了大国间利益联系日益紧密的现实,与时代潮流相背离。况且在当今国际社会,尚没有一个国家能有实力与国际威望去实行这一战略。在既无便车可搭而又无力“自驾车”的困境下,各大国实现崛起与强国战略唯有寻找“第三条道路”,“有偿推车”战略由此应运而生。

“有偿推车”战略是指:在保持现有霸权体系稳定的前提下,通过与霸权国的讨价还价最终形成大

国合作,共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是一种双赢或多赢战略,不仅能减少霸权更迭的暴力性,还能为大国的发展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选择“有偿推车”战略的大国应具有“推车”的实力与意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从现行国际秩序中获利,并对现有国际体系具有较高的认同。

“有偿推车”战略的出现与当前国际战略环境尤其是大国间密切互动的态势紧密相关。首先,霸权国陷入战略困境,迫切需要其他大国助其“推车”。多国合作而不是独力支付公共产品符合霸权国的利益,只要能维持霸权秩序的正常运作,霸权国就能继续拥有优势地位。其次,霸权国愿以有限分享“全球治权”为代价换取其他大国助其“推车”。在此,需要对霸权与治权的关系进行厘清。“全球治权”可以被定义为:霸权国在全球层面行使霸权的方式。因为全球治理的议题存在层次上的差异,所以也就具有不同敏感度的治理权限,这就使“全球治权”的有限分享成为可能。霸权是一种超群的优势地位,具有不可分割性、不可转让性;而霸权的行使方式即“全球治权”是可转让、可分割的。“全球治权”的变化只要不对霸权造成根本性的威胁,霸权就不会丧失,霸权国就仍是国际秩序中最大的受益者。第三,“有偿推车”符合国际大趋势与各方利益。在“免费搭车”难以为继、“自驾车”成本过高的情势下,选择“有偿推车”战略的大国愿意分担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成本,这不仅有助于维护国际秩序稳定,还能借机与霸权国讨价还价,改革原有的机制与制度,改变国际秩序中某些不公正之处,提高本国国际地位。另外,成本的分担也有利于避免国际公共产品被霸权国“私物化”的危险,提高大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和主动权。相反,如果对在国际经济结构中江河日下的霸权国“见死不救”,就有可能导致新一轮国际政治结构变革的代价高昂,并导致“皆输”的结果。

二、中美互动态势与“有偿推车”

目前,霸权处于下行阶段、国际上遭遇战略困境、国内经济深陷金融危机的美国已经无力独自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它迫切需要其他大国助其“推

车”,以维持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在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共生”关系日益加强的情势下,美国把中国当作最佳的“推车搭档”,而“助美推车”也是中国的理性选择。伴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形势的继续发展,中美之间实施“有偿推车”战略的互动态势日益明朗。

从美国方面看,美国的权力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在于,越来越多的问题不受它控制,解决这些问题已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支持。首先从金融领域看,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美国在二战结束以来一直保持的国际金融霸权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金融霸权是美国经济霸权的核心部分,而经济霸权又是美国霸权的基础。金融危机延续的时间越长,对美国霸权地位的冲击就越严重,这必然促使急于走出危机的美国更加需要与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与中国合作。到2008年12月,中国拥有19460.3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成为拥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中国对美元的信心直接决定美元是否能继续拥有在牙买加体系中的半壁江山,能否继续享有国际储备货币的种种好处。因此,维护世界金融体系与美元币值的稳定是美国迫切需要中国协助与支持的议题之一。

其次,美国还面临着诸多安全困境。一方面,阿富汗民主进程缓慢、人权状况恶化、政局动荡,塔利班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塔利班化”蔓延,核武库安全形势严峻。美国要想缓解阿富汗、巴基斯坦日益严峻的安全形势,必须借重中国在该地区的地缘优势与传统影响力。另一方面,美国在防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致使国际防扩散形势日趋严峻,在朝核和伊朗核问题上需要中国积极斡旋。此外,美国的全球反恐“越反越恐”。虽然在“9·11”之后美国境内暂时没有发生恐怖袭击,但美国却陷入了看不到尽头的反恐“长期战争”,这给美国带来难以承受的战略压力。在反恐问题上美国也迫切需要得到中国的继续支持与合作。

第三,在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问题上,美国同样陷入被动境地。作为世界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美国至今仍游离于《京都议定书》之

外。对此,包括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均表示了强烈不满。奥巴马上台之初就承诺气候环保问题是其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为履行承诺与重塑美国的威望,美国必须推动国际环保事业的进展。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重要的角色是美国、中国,奥巴马政府欲在环保问题上取得进展,必然要同中国寻求共同的立场,达成合作与默契,借此巩固其在国际上的声望。

奥巴马政府“巧实力”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通过多边协商、“合作外交”谋求新的伙伴,摆脱美国面临的困境。为了寻求中国助其“推车”,美国做出了一系列对华示好举措。其一是一再凸显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提升两国合作的等级。2009年4月1日20国集团伦敦峰会期间,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奥巴马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令人瞩目地向前发展。美中两国不仅有着非常紧密的经济关系,而且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许多共同利益”,双方确定了“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这向外界发出了重要而积极的信号。2009年7月27-28日由美方率先提议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这是奥巴马上任以后中美之间启动的一种新的高层对话机制,其级别从“部长级”升格为“内阁级”,对话内容加大了战略性、战略性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结合更加紧密。11月15-18日奥巴马访华,在中国停留了4天3夜,这是奥巴马亚洲之旅中访问时间最长的一站,足见其对中国的重视。此次奥巴马访华的会谈结果以“中美联合声明”形式发表,“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

中国人民银行黄金与外汇储备报表, <http://www.pbc.gov.cn/diaochaotongji/tongjishuju/gofile.asp?file=2008S09.htm>

CSIS COMM ESSDN ON SMART POWER, “A smarter, more secure America”, CoChairs: Richard L. Armitage, Joseph S. Nye, Jr.,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071106_csissmartpowerreport.pdf, pp. 12-13.

“胡锦涛同美国总统奥巴马1日在伦敦举行首次会晤”,中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gov.cn/kdhd/2009-04/01/content_1275197.htm

国”。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双方合作范围更加深广。

其二是继续对华开放市场,发出松动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的信号。尽管中美贸易纠纷不断,但双方都力求依靠谈判而不是打“贸易报复战”来解决问题。美国在金融危机中仍对华开放其国内市场,美国仍是中国商品的巨大销售市场之一。希拉里国务卿2009年2月13日在美国亚洲协会的演讲中说:“美中两国发展积极的关系,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极为重要。在经贸等领域与中国加强合作、分享机会符合美国的利益。”此外,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表示,美国认识到中方在美对华出口管制等问题上的关切,愿采取措施,增加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由于近年中欧关系从“蜜月期”步入“调整期”,欧盟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呈逐步下降趋势。如果美国此时能开启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大门,无疑会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其三是公开欢迎两岸关系平稳发展。美国在《中美联合声明》中表示“欢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1]“双方重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根本原则是指导中美关系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双方均不支持任何势力破坏这一原则的任何行动。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有从美中共同的战略利益出发,重新认识和对待台湾问题的意愿,明确承认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尊重中国的立场,打击“台独”,积极鼓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行政治对话,逐步解决政治问题。这也表明,台湾问题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分量有所下降。

其四是支持按照匹兹堡峰会领导人声明增加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权。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份额、投票权,量化与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一直是中国强调应尽早落实的改革目标。在2009年7月28日举行的中美经济对话第三场专题会议上,美国表示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和代表

权,同时将支持充分考虑中国合格候选人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担任高级职务。美国这一表态,有助于实现中国关于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构建强有力的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张,无疑获得中国的认同与支持。

从中国方面看,“有偿助美推车”战略符合当前国际、国内战略环境,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从经济、政治到安全方面,美国都面临一系列难题,单凭其本身很难继续提供充足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再无继续“免费搭车”的可能。另一方面,选择“自驾车”战略不符合中国目前较弱的整体实力,不但会造成国际局势动荡,而且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背道而驰。此外,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总体上符合中国和平发展的根本利益,而美国霸权的崩溃会导致中国的利益损失。尽管西方国家制定了国际经贸的游戏规则,但这种以自由贸易、严格的制度与规范为基础的开放型秩序,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危机中美元币值的下挫,意味着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与外汇储备存在持续贬值的巨大风险。截至2009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2.2726万亿美元,持有美国国债7989亿美元。由于美元在中国的外汇储备结构中一直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美元币值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经济安全。因此,“有偿助美推车”不失为当前中国最为可行的战略选择。

“中美联合声明(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www.mfa.gov.cn/chn/gxh/tyb/zyxw/t627468.htm>.

Hillary Rodham Clinton, “U. S. - Asia Relations: Indispensable to Our Future”, February 13, 2009,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m/2009a/02/117333.htm>.

“温家宝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zyxw/t627753.htm>.

宋新宁教授2009年11月在外交学院的演讲:“转型中的中欧关系”。

“中美联合声明(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www.mfa.gov.cn/chn/gxh/tyb/zyxw/t627468.htm>.

“美支持中国候选人担任国际金融机构高级职务”,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n/cj/cj-gjcj/news/2009/07-29/1794586.shtml>.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08, Vol. 87, Issue 1, pp. 23-37.

中国人民银行黄金与外汇储备报表, <http://www.pbc.gov.cn/diaochaotongji/tongjishuju/gofile.asp?file=2009S09.htm>.

U. 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Federal Reserve Board, <http://www.ustreas.gov/press/reports.html>.

三、中国应该如何“有偿推车”?

“有偿推车”战略可以分解为“有偿”+“推车”,报偿是推车的回报,推车是报偿的责任。也就是说,中国首先要明确自己的重要利益关切之所在,才能在“助美推车”过程中要求美作出恰如其愿的报偿。任何一个战略都必须依据国家利益来构建。此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力促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却并未充分考虑中国自身的利益需求。中美交往中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中国的利益长期被忽视,如何体现中国的利益成为中美乃至中西交往的重大问题。在“助美推车”过程中,中国对美的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台湾问题上,促美遏制台独,防止两岸军备竞赛。台海问题不仅涉及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也攸关整个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台湾不独、维持两岸的正向互动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尽管奥巴马在《中美联合声明》中表示乐意看到两岸交流的发展,但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仍然是阻碍中美两国互信的最大障碍。中国应以助美维持东亚地区稳定换取美协助中国遏制台独,减少对台军售的规模直至停止,这是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诉求。

在人权问题上,中国期望美国领导人不再接见达赖喇嘛等分裂分子,不借人权之名干涉中国内政。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将人权外交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常常以人权之名在西藏、新疆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虽然达赖至今并未受到奥巴马的会见,可以视为美国对华示好的表现,但中国更希望美国能长期坚持这一态度,绝不姑息、庇护“藏独”和“疆独”等分裂势力。此外,中美应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处理两国在人权领域存在的分歧,推动双方智库、学界的交流,避免两国在人权领域进行无谓的争吵,促使两国人权对话向机制化发展。

在周边安全方面,减弱美国在中国周边所发挥的消极作用,防止南海争端国际化。中国军力上升被美国作为其在东亚部署导弹防御体系的借口,以及构建美日澳“亚洲版北约”的理由。中国应充分利用中美共生的经济利益关系,使美国充分认识到武力遏制中国的错误。此外,美国监测船经常进入

中国南海的200海里经济专属区进行侦察,“无暇”号事件表明两国在南海海域存在擦枪走火的可能。中国应在海上运输安全、中国与相关国家就南海划界及开发等问题上与美达成默契,使南海争端处于可控范围。

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期望美国尽快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有责无权”一直是困扰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领域难以有所作为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大国一直牢牢控制全球经济秩序的主导权。如在MF中,根据“新发特别提款权(SDR)按照现有份额比例派发”的原则,美国将继续维持其在MF中“一股独大”地位。因为按照MF规则,由于重要提案需要获得85%的投票权才能通过,这让拥有约17%投票权的美国在MF重大议题决策上具有“一票否决权”。中国在MF仅拥有3.72%的投票权,这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以及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极不相称。中国应利用G20峰会等多边场合,联合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对代表权的合理关切和期望,倡议尽快落实20国集团匹兹堡峰会确定的量化改革目标,完善国际金融机构决策程序和机制,设立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管机制,逐步增加中印等发展中大国在MF中的份额,修正MF和WB对发展中国家贷款援助中存在的歧视性、附带政治条件等不公正的做法。

明确了对美利益诉求,中国如何“助美推车”也需要有深入的战略考量。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首先,进一步维护世界金融稳定是中国“助美推车”的重要领域,也是兑现国际责任承诺的明证。在谨慎灵活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同时,保持对美元的信心。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能够保持稳定是全球金融稳定的核心要素,与美国共同维护美元币值的稳定是中国对世界金融稳定做出的巨大贡献。另外,中国应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

Terry L. Deibel, *Foreign Affairs Strategy - logic for American Statecraf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0.

应该是与美联手应对金融危机、继续推进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内需计划使中国经济增长率从2008年第四季度的6.8%迅速升至2009年第三季度的7.7%，2009年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势头，不仅增强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还为美国、日本、欧盟等贸易伙伴摆脱金融危机的困扰带来希望。中国继续保持对美元的信心，不在美国面临困境时抛售美元，这在避免“特里芬难题”的同时，也有助于增强美国对中国的信任，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信誉。

其次，继续深化中美在环保、低碳经济以及新能源领域的合作是中国“助美推车”的重要突破口。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趋势，将带来新的需求和就业，也是美国刺激经济增长的新领域。在新能源和低碳领域，《中美联合声明》明确了中国以市场换技术，而美国则以技术换市场的合作方向。美国和中国新能源合作互补性非常强，只要在制度上、合作要素上构建相应的规范，中美新能源合作就会取得双赢效果。此外，中国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推进向环保经济转型。(1)大力支持国有节能企业与国际同行的合作，削减高排放工程项目；(2)利用国家对经济的强大影响力，通过各种经济和金融调节杠杆，引导国内投资向环保、低碳领域流动；(3)积极引进美日等发达国家在节能、环保、开发新能源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放国内环保产业市场，努力促进低碳产业设备国产化。

第三，从经济领域向安全领域、从亚太向全球扩展是中国“助美推车”的大趋势。功能主义认为，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会向政治、军事领域的合作扩展，并为后者打下基础。防核扩散是中美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应在“核供应国集团”、“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等防扩散组织中积极发挥作用，继续推动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和平解决，鼓励美朝直接对话，利用中朝友好关系，劝阻其放弃核计划，回到六方会谈的框架中来；向阿富汗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援助，向巴基斯坦提供帮助以稳定其国内局势；与美进一步加强对话与合作，打击跨国犯罪、恐怖主义、非法毒品贸易、海盗等跨国挑战。在军事合作中，深化与美建立军事信任措施、功能性交流和互访，进行海上搜救、反恐、打击海盗、应对自然灾害等联合演习，与美

进行反恐情报的沟通与交流，以平等互利共赢的理念规划中美安全合作，为中美稳定的安全合作提供基础。

最后，量力而行是原则，不承担与本国实力不符的国际责任。最近美国国内明显出现一种拉抬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声音，炒作“G2”、“中美共同体”(Chimerica)等概念，其背后有明显“捧杀”中国并压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意图。对此中国应该保持足够的清醒。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是发展中大国这个身份不会改变。既然是大国，当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则必须审时度势，量力而行。中国实施“有偿推车”战略应该与中国在当前国际政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紧密结合，做到“不争位”、“不越位”、“做到位”，即不与美国争夺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不做超过中国发展中大国身份之外的事、把中国份内的事情做好。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助美推车”过程中必须以本国利益为中心，在涉及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方式上，应强调协商对话的平等性，以自主为前提、以共识为基础形成合作原则与机制，对国际上吹捧中国的宣传淡然处之，努力处理好国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避免承担超越本国承受能力的责任。

从根本上讲，“有偿推车”战略是一种在实事求是原则指导下的决策，符合中国当前面临的国情与世情，也符合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国际公共产品匮乏的今天，中国和美国都应遵循由经到政、由易到难的原则，承担相应的责任，通过国家间的协议、契约、选择性激励机制等方式促进合作，维持国际秩序的基本稳定。总而言之，维持现存国际秩序的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适度承担与中国经济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向国际社会提供包括制度架构在内的国际公共产品，有利于中国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参与者向管理者转变。

(责任编辑：沈碧莲)

“国内生产总值(2009年3季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jdsj/20091022_402595487.htm。

David Mitrany, *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Politics*, London School and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1975, pp. 124 - 127; Robert Keohane, Stanley Hoffman ed.: *The New European Community Decision-making and Institution Change*, Westview Press, 1991, p. 19.